

# 马克思晚年现代化道路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方法创新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得表征马克思哲学的唯物史观得以问世,那么马克思晚年用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审视现代化道路,就是对现代化道路本质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用唯物史观对现代化道路实现的条件进行历史性分析,在批判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理论的同时,也表征了现代化道路本身应该是一种可选择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运用,既将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正式纳入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又通过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起源问题等的回答,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现实可能。通过对古代社会氏族制度、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和俄国发展道路的个案分析,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明确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社会发展道路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也论证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科学性。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思维方式;唯物史观审视;现代化道路反思;现代化道路多样性;另一种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6-0021-09

与马克思早期唯物史观的思想性研究相比,马克思晚年<sup>①</sup>唯物史观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研究,还是一种实证性质的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晚年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重新审视“传统现代化道路”,以期能够发现现代化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道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的全部著述来看,虽然他并没有专门写作以现代性为主题的理论文章,但在一定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就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而言,现代化是现代性的现实表达,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哲学概括。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本质上就是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从研究方法的视角理解,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还践行了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和借鉴了社会科

学的“个案分析方法”。这一方法论层面的创新,使得社会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研究更具有“科学性”的意蕴——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深度探讨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下现代化道路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精髓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sup>②</sup>。

## 一、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运用与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唯物史观反思

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既是马克思晚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唯物史观能够正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依据。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观点往往以割裂历史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企图将传统现代化道路描

收稿日期: 2023-09-05; 修回日期: 2023-1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设研究”(22VRC006)

作者简介: 曹典顺,男,江苏沛县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等

绘为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选择。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既认识到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思维方式的唯心史观本质,也为科学认知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支持。这种方法论支持表现为,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通过对现代化道路实现条件的历史性分析,在批判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理论的同时,表征了现代化道路本身应该是一种可选择性的发展道路。

### (一) 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本质

所谓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是指将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视为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唯一道路选择。这种“唯一性”表现为,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必然要走上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认知方式实际上是在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上谈论现代化道路问题,即它“把现代化还原为某种超历史、超时空的普遍性原则和公式,认为它拥有可以运用到任何时空和所有地方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对不同的、异质性的社会和民族都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力量”<sup>[1]</sup>。换言之,如果传统现代化道路被预设作为一种只能被执行而不能被质疑的必然性、真理性的存在,那么它的必然性与真理性的确证问题就成了理论困难。

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试图通过论证资本的先在性来说明这一道路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然而,该理论预设本身却忽视了资本形成的历史性与条件性。因为,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观点是“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sup>[2](452)</sup>,是一种将资本当作先在前提的荒诞认知。马克思揭露并批判了这种认知方式,在他看来,货币和商品“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sup>[3](821)</sup>。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缺乏“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货币和商品的资本化,是无法确保传统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各国都必然坚持的社会组织发展道路。

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历史性与条件性的剥离,将传统现代化道路描绘成一种普适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对各

民族和国家历史语境差异性的忽视,而且是以一种同质化的方式理解这种差异性。在探讨理解历史现象的正确钥匙是什么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4](145)</sup>。据此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走传统现代化道路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发展成果,也不能说明这种发展道路就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如果后发国家不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是很难取得与先发国家相类似的发展成果的,甚至会失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成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正是基于对各民族国家历史条件同质化理解方式的否定,马克思在探讨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时,才得出了“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sup>[4](143)</sup>的结论。

### (二) 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为社会发展道路确立提供了正确的认知方法

基于对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和选择不能以割裂历史为前提,他将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作为选择和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认知方法。这种科学认知方法的产生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马克思意识到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应当遵循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而对这一客观规律的把握需要通过以往社会历史的分析与研究来实现。其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性是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理解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历史条件的不同,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该民族和该国家实际发展需求的正确道路选择。其三,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身“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3](10-13)</sup>,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应当兼顾其过去的发展情况、现在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历史的发展形式对一切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样的。普通的世代交替

永远不是发展过程的稳固性和强度的标志”<sup>[5](76)</sup>。因此，人们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时，不仅要注意到各民族和国家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认识到各民族和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发展上的差异。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sup>[6](487)</sup>。马克思的观点十分明确，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除了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关系的总体状况，做出与该民族和国家实际发展阶段相符的道路选择。这也是马克思晚年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虽然不是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特有的研究方法，但正是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坚持，马克思晚年在研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才没有陷入僵化和教条化的理解。一方面，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拓宽了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不仅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也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资本主义史前史，这使得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能够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理解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另一方面，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得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能够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对社会历史的僵化理解造成了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这种错误的理论认知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等同于人类社会发展史，忽视了具体语境中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考察。列宁在总结马克思这一理论贡献时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7](375)</sup>正是这种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历史性考察使得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能够始终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审视和探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被西方中心主义所蒙蔽。

### (三)“社会历史条件多样性”唯物史观原理否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逻辑”

马克思晚年对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

理论批判，不仅表现为对认知方式上的唯心史观本质的批判，还表现为对认知逻辑上的“标准化”理解的批判。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逻辑”将现代化的实现理解为一种“标准化”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逻辑认为，只有符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是现代化的体现，凡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不一致的都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对此，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sup>[8](48)</sup>。这种理解表明，马泰·卡林内斯库认识到作为现代性外在表现的现代化道路，不应被局限于“标准化”的发展模式之中。

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认为，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标准化”理解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多样性。马克思在对古罗马的发展道路进行历史分析后发现，尽管古罗马平民与英国平民一样都由“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成为被剥夺的对象，也都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但是古罗马平民并没有像英国平民那样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sup>[4](145)</sup>。这就是说，古罗马虽然与英国一样也存在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料相分离的平民，但是它并没有按照英国的发展历程那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为奴隶制国家。由此可见，即便是一些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多样性，这些民族国家也不会直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也并非都适合走传统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通过对社会条件多样性的研究，否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逻辑”。一方面，社会历史条件的多样性表现为各民族国家发展的非同步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如英法等国已然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确立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俄国等相对薄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仍受到封建主义残余等的影响。这些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很难帮助它们追上甚至超越先发国家。另一方面，社会历史条件的多样性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的多元性，即同一社会形态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如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就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sup>[4](20-21)</sup>。既然同一社会形态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备不同的社会基本特征,那么,其对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它的现代化道路就不能被固定在某种“标准化”的发展模式之中,而应具备可选择性的发展特质。

## 二、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 践行与现代化发展道路多样性的 现实可能分析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才开启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进行过对人类社会起源问题的探讨。但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马克思对该社会形态的认知主要基于逻辑性质的判断。这就为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具有实证性质的科学性研究,预留了许多研究空间。换言之,马克思前期的唯物史观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但是还未能够实现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针对性把握。马克思晚年运用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既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归纳为一种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发展道路,还表征了它是一种科学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猴体解剖方法”,但直到晚年时期,他才在探索“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中充分运用这一研究方法。

### (一)“现代化道路”是一种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发展道路

唯物史观虽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它并不否认现代化的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现代化而言,现代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现代化则意味着在发展上实现对过去的超越。这种超越式的发展既表现为对蒙昧状态的摆脱,也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还表现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替代。作为现代化典型案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不仅使人们摆脱了封建专制下的蒙昧状态,实

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变革,还以资本主义文明取代了封建主义文明。然而,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性研究发现,“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sup>[9](176)</sup>。按照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劳动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且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状态,如果仅仅限定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研究之中,就无法认识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全部价值。

就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聚焦于现代化道路研究的目的而言,他并不是为了给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范本,而是试图阐明社会历史条件对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重要性。以俄国为例,马克思认为仅凭“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在西欧的消失是无法说明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必然解体,在他看来,“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sup>[4](471)</sup>。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俄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基于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仅仅以欧洲的发展经验为依据,既无法说明俄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也无法为俄国的未来提供科学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马克思为了回答“查苏利奇之问”,晚年不仅专门学习了俄语,还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东方村社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溯源。这些理论研究,都为马克思能够更好地把握俄国与其他西欧国家在社会历史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做了准备。

现代化道路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具有无法割裂的紧密关联,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植根于社会历史条件。唯物史观认为,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sup>[10](132)</sup>。所谓“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指的就是社会历史条件。现代化道路作为人民创造历史活动时道路选择的现实表达,是在充分考虑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也是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现代化道路实现的物质条件。现代化道路如果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概念表达,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不

具备从理论设想转变为现实实践的基本条件。更为具体地说，社会历史条件对现代化道路的实现具有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对于现代化的接受程度，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的方式以及现代化转向的程度等。无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还是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的“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实践，都应当在充分考虑本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展开。

## （二）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是一种科学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研究方法

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科学性，能够通过社会发展道路的实证性研究来体现。“史学研究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基本上有两种：逻辑方法和实证的比较分析方法，简称为实证方法。”<sup>[11](66)</sup>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更为准确地说，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研究中，马克思采用了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这是一种以抽象意蕴为主的逻辑性研究方法。与之相对，马克思晚年采用的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则是一种贯彻实证主义思想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做出上述区分，是因为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认为“概念所教导的东西也必然就是历史所显示的”<sup>[12](序言 16)</sup>，所以，按照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不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去寻找依据，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已完成形态，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来实现。与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的定性分析不同，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更加注重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定量分析。这使得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都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对原始社会形态更替、东方村社构成等问题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实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而是对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的补充。由于缺乏翔实的史料资源，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研究时，提出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2](47)</sup>的观点，主张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起点去研究古代社会，“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

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sup>[2](453)</sup>。因为，“只有靠大量地、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sup>[13](527)</sup>。既然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方法”的研究主要是在逻辑演绎层面进行如同方程式推理一般的演算，那么，通过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实证性研究，就是对这些演算得来的方程式进行论证，是对这些方程式是否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证实。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进行的由从后思索的“人体解剖”向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的方法转换，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展现。

作为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创新，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它将前资本主义社会正式纳入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视域之中。之所以称其为“正式”，是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唯物史观研究虽然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内容，但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相比，不仅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成为马克思前期唯物史观研究的直接研究对象，而且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也不是前期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内容。晚年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土地公有制的重要性，他也直截了当地指出，通过对西方社会起源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土地所有制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源头随处可见<sup>[4](476)</sup>。这种对于土地公有制的研究和重视，就是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着眼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试图挖掘可供未来社会借鉴的社会建设思路。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就是未来社会的理想所有制形式。

## （三）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践行了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

从宏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在前期唯物史观研究视域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是一种社会形态更替意义上的研究，并不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专门性研究。马克思进行的也只是一种说明性意义上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但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可以说是一种微观层面的、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专门性

研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sup>[14]</sup>。也正是认识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晚年的马克思才会暂时放下《资本论》的写作,转而研究史前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起点等问题,试图实现唯物史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把握,从而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建设理论。

马克思晚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采用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可能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sup>[2][46]</sup>。而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猴体”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前资本主义社会指代的就是代表了历史的“猴体”,资本主义社会则对应了代表现实的“人体”。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甚至是找寻到未来社会建设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是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践行。也就是说,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不仅属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范畴,更是唯物史观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根据。

正是通过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践行,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不仅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写,还实现了研究范式意义上的“人类学转向”。恩格斯曾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sup>[15][31]</sup>。恩格斯的观点很明确,摩尔根虽然不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目的的,但是却通过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正是因为马克思晚年关注到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马克思唯物史观才意识到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开展实证性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着手进

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从一定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践行,是建立在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等人的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

### 三、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借鉴与“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探索

与哲学逻辑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分析方法”,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性,实现对客观事物全面而真实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对古代社会氏族制度、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和俄国发展道路等进行考察时,借鉴了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这不仅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应该是一种科学性思维的社会发展道路,还表明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可以被运用到唯物史观研究中的具有广泛运用价值的研究方法。

#### (一)“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种科学性思维的社会发展道路

“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提出,本质上是对“现代化=西方化”观念的根本否定。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发展道路“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sup>[16][75]</sup>。这种发展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其他后发国家,都试图通过走西方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建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假象。“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提出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言的。就“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另一种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西方现代化”和“另一种现代化”属于“现代化”的具体表现,而“另一种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则不是一种从属关系。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对“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本质上就是要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是遵循人类社

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展道路。虽然这种发展道路以社会历史条件多样性为认知前提，但它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发展道路并不冲突。换言之，对“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不能够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应当遵循的客观规律，而且“一国历史的任何特点都不能使该国逃出一般的社会学规律的作用”<sup>[17](332)</sup>。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探讨俄国发展问题时，提出“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sup>[4](461-462)</sup>，并将其视为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本质上是为了利用西方已经形成的文明成果来弥补俄国在发展上的不足。如果抛弃了这一前提，不顾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强行促使俄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为共产主义社会，只会走向揠苗助长式的、非科学的发展，从而出现无法估量的错误后果。

“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设计，是在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史基础上完成的。爱因斯坦认为，思辨哲学家“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sup>[18](101)</sup>。与思辨哲学家不同的是，唯物史观研究“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9](544)</sup>。这表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道路研究，既要从现实问题出发，也要从社会历史中寻找发展根据。事实上，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讨，就是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考察与追问中进行的。马克思的这些研究表明，“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是在纯粹概念框架体系中的思辨推演，而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设。

## （二）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是一种具有广泛运用价值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指的是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事物本质更加深刻和全面认识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具有广泛运用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都可以借鉴社会科学的“个案分

析方法”。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sup>[19](444)</sup>。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其实已经很难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但他依然选择将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用在“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研究上。显然，在马克思的认知中，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是一种可以运用到唯物史观研究之中的具有广泛运用价值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转向，本质上就是对“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论学术界对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的理解存在何种差别：如将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理解为民族学研究，又或者将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理解为人类学研究等，这些观点持有者都无法否认，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仍属于社会发展道路视域的研究，是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具体呈现。但在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时，马克思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研究对象和更为繁琐的研究工作。就马克思晚年研究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而言，《人类学笔记》侧重于古代社会研究，它“上溯其起源于蒙昧阶段，下迄其崩溃于文明阶段”<sup>[20](64)</sup>；《历史学笔记》则“包括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前后长达1700多年”<sup>[11](132)</sup>。如果要对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人类史前史进行详尽且全面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这对于晚年的马克思而言，显然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而且，从空间视角理解，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的出发点是更为宏大的世界史，因此，基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只能借助于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来确保本质为“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科学性。

## （三）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考察借鉴了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

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的借鉴，体现在对不同氏族制度的探讨中，体现在对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路径的考察中，体现在对东西方发展模式的比较中。在对不同氏族体制进行探讨时，马克思发现，虽然氏族制度是古代社会一种普遍的制度模式，



但由于地域、文化等的差异,不仅不同部落的体制存在差异,而且同一部落的体制也因为氏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别。为了能够更好地认识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度,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将易洛魁人、加诺万尼亚和希腊人的氏族制度作为研究氏族制度的典型案例。在考察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路径时,由于时间跨度巨大,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无法像通史研究那样,对西欧所有国家的发展路径都进行梳理,但他仍选取了土耳其、意大利、英国、德国等主要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封建制度的历史考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更为全面的把握。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他反对“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sup>[21](385)</sup>,即马克思反对混淆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为了确证东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异性,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俄国问题、印度问题与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通过对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个案分析”,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发现,社会形态的演进不仅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具体而言,在唯物史观创设之初,马克思是以生产关系为依据的,概括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实现了对社会形态的科学划分。然而,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指出,不仅原始社会不能简单概括为部落所有制形式,而且在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中,社会发展道路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发展具体呈现为,“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sup>[4](467-468)</sup>,而“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sup>[22](43)</sup>。

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个案分析”,既使得人们对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为“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发展的可行性根据。一方面,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再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野蛮的掠夺本性,否定了传统现代化道路。如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不仅以“羊吃人”来表明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圈地运动对农民的掠夺,还对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的殖民扩张行为进行了批判,表明这种道路“既不会给人

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它们的社会状况”,相反,它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sup>[23](250)</sup>。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设计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化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sup>[4](463)</sup>。这就是说,由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是以探寻“资本主义消解道路”作为研究目标的,所以,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史前史的“个案分析”就是要推进“资本主义消解道路”的研究,并从中寻找到“另一种现代化”的现实性发展道路。

#### 注释:

- ① 关于马克思晚年思维方式转变和研究转向的动机问题、马克思晚年进行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原因等,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仅就马克思晚年的思维方式本身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深入挖掘。
- ② 马克思晚年时期,指的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期。

#### 参考文献:

- [1] 贺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J]. 哲学研究, 2022(12): 5-14, 12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安·拉布里奥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 杨启滨, 孙魁,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7] 列宁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 [1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 1962.
- [18] 爱因斯坦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9]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3 版. 王珍,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20] 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21] 马克思.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The innovation of materialist historical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Marx's modernization path in his late years

CAO Dianshun

(Philosophy Paradigms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f the discovery of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marked Marx's philosophy, then in his later years, his examining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with the thinking mod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dicated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essence of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In his later years, Marx,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fered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uniqueness" of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presented that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itself should be an "optional" path. Marx's application, in his later year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of the "monkey anatomy method" that he had previously pondered, not only formally incorporated the study of "pre-capitalist society" into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further clarified the practical possibility of "diversity" in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by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clan system in ancient society, the major nation-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ssia,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later years not only clarified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ath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and countrie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scientificity of exploring "another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rx's thinking mode in his later year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examination; reflection on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diversity of paths toward modernization; another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编辑: 胡兴华]